

屈

国 中诗苑 英华

世界四大文化名人

中国第一个伟大诗人

开浪漫主义先河

爱国主义伟辞

天地比寿

可与日月争光



路漫漫其
修远兮吾将
上下而求索



山东大学出版社

原

卷

111
L421
249

中国诗苑英华

屈原卷

王培源 注

山东大学出版社

P 1997年11月26日

中国诗苑英华

屈原卷

王培源 选注

责任编辑 王延梯

特约编辑 苏 生

封面设计 牛 钧

内版设计 赵 岩

责任校对 张华芳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 25010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176 千字

1997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5607-1746-2/I·129

定 价:(全十册)118.00 元

序

王运熙

我国数千年的文化历史中，涌现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诗歌、散文、戏曲、小说、讲唱文学等等，各体皆备。其中尤以诗歌成果更见辉煌，源远流长，大家迭出，真不愧有诗国之称。

中国诗歌具有光辉的历史。在先秦时代，先是以四言句为主的诗体流行，后经人们选录三百余篇，编集成《诗经》。稍后则是句式长短参差的楚辞体（亦称骚体）产生，被后人编集成《楚辞》。《诗经》、《楚辞》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两大源头，以其丰富的营养，哺育着后世千千万万的文人。到汉魏两晋南北朝时代，五言诗逐步发展昌盛，七言诗也逐步成长，五、七言古体诗成为诗歌的主要样式。在此时期内，作诗成为一种风气，名家辈出，灿烂多姿。之后是隋唐五代。国势强大的唐帝国，经济、文化发达，为诗歌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唐代是中国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诗苑涌现出不少名家巨匠。诗体方面，除五、七言古体诗外，还形成五、七言近体诗。从此，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这

六种诗歌基本样式，长期为人们所遵用，直到现代。宋承唐代，文化、文学继续发达。在唐诗的高峰后面，宋诗往往写得机智而富有理趣，别开生面，与唐诗争胜。同时，在唐五代形成的词（定型的长短句），至宋代繁荣昌盛，形成了诗、词两体双峰对峙、各擅胜场的局面。在《诗经》、《楚辞》之后，人们一提到中国古代诗歌，总是首先想到唐诗、宋词，它们标志着中国中古时期诗歌的辉煌成就。以后在元、明、清时代，五、七言诗和词继续发展，也产生了许多名家、佳作，但总的说来，诗人们以学习、宗法唐、宋为主，创造性比唐、宋较为逊色。此时期还出现了新型长短句散曲，也有名家佳作，惜表现的广度、深度比不上词。这时期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转移到了戏曲、小说方面。

这套《中国诗苑英华》丛书，选择历代成就最为卓越的少数诗家、词家，编选其部分名篇佳作，供广大读者学习欣赏。于先秦取屈原，于汉魏两晋南北朝取陶渊明，于唐取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于宋取苏轼、陆游、李清照、辛弃疾。这十位大家，代表了各个历史时期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的确不愧为诗苑中光彩最为夺目的英华。他（她）们的诗歌内容广阔深厚：热爱国家民族，甚至愿意为之赴汤蹈火；关怀人民痛苦，希望社会安定；憎恨黑暗腐朽势力，予以揭露和鞭鞑；描绘山川草木，展示祖国和乡土的辽阔美丽；歌咏爱情和亲朋好友，流露真挚深厚的胸怀，等等。这些，对于我们培养热爱祖国人民、热爱生活的思想感情，认识古代社会的诸般情状，认识大

诗人的高尚品格，从而陶冶自己的情操，都将产生不可低估的作用。从表现形式看，十位大诗人都是第一流的艺术巨匠。他们构思深邃，才华横溢，语言精炼生动，技巧变化多端，风格或奔放流畅，或深沉顿挫，或平淡隽永，或缠绵曲折，多姿多彩，无不具有强大的艺术魅力，使我们获得丰富的美感享受，和从事创作活动的启发和借鉴。

弘扬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学遗产，是为了促进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广大人民的思想道德品质和文化素养，为创作新时代的文学提供营养和借鉴。希望这套丛书在这方面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

1996年12月

前言

中国古典诗歌创作的领域，是一个百花盛开的园地。无数的耕耘者，曾经在这片土地上，播撒过他们的汗水和血泪。其中，曾被作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隆重纪念的屈原，无疑是一个最有个性、最有创造力的伟大诗人。他以自己的生命和激情融铸而成的诗篇，闪耀着理想、奋斗和人格的不朽光辉，成为我国古典诗歌个人创作的第一座丰碑。

—

屈原是用自己的生命在歌唱的。

屈原的一生，有过辉煌，有过得意，但更多的是失望和痛苦。正是失望和痛苦才激发出屈原不朽的诗章。

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为我们留下了这位诗人的踪迹。他这样叙述屈原的得意与不幸：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

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

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

屈原的一生正是这样坎坷的一生。也正是这种坎坷遭遇，才使屈原前后的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造成了他无法遏制而必欲吐之的诗情。

屈原是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的爱国者。在战国诸侯争雄的时代中，在“横则秦王，从则楚帝”的形势下，屈原是企图以强大的楚国为中心来建立一种新的政治秩序。因此，他希望在楚国能“明法度之嫌疑”、“举贤而授能兮，遵绳墨而不颇”，从而达到“国富强而法立”的“美政”目的。并且在他踏上仕途之后，也确实受到怀王的信任和重视。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能够长期继续下去。在楚怀王态度的反复多变和谗臣贵幸的包围之下，他被排挤出了政治的中心，远离了朝廷，在放流迁逐中度过了他的后半生。这种迁逐生活，使他的政治理想陷于破灭的境地。这使他的内心产生了极度

的痛苦。“愤怒出诗人”。他开始用诗歌的形式来倾诉自己的心声。正如司马迁在叙述到屈原创作《离骚》时的情况那样：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不断的放流生活，产生出屈原一系列的诗篇。

然而，由于史载的语焉不详，关于屈原的“放流”，产生出了许多的疑问。集中起来，主要在于放流的时间、次数与地点。司马迁在屈原传记中始而曰“王怒而疏屈平”，继而曰“顷襄王怒而迁之”，成为我们了解这一问题的基本线索。结合屈原作品提供的情况，考察楚国怀王、顷襄王两朝政治、军事活动的状况，大致可以这样认为：在怀王在位期间，屈原是疏而不用，即所谓“屈平既疏，不复在位”，失去了政治上的发言权。在其作品中，表现了失望与期望并存的情况。至于怀王与秦会、入武关而被拘，屈原因有劝阻之言，与子兰之意相左。至顷襄王立，则被谗而放逐，始在汉北，继迁江南，即所谓“怒而迁之”之谓。至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破郢，屈原遂自沉汨罗而死。故其流放期间的作品，基调越来越悲愤，虽忠贞之心不改，但却越来越坚定了以死殉志的决心。屈原的诗作，正是这些遭遇所导致的激切悲愤心情的抒发，是用生命之火焙烧出的理想的结晶。

屈原又是楚国独特的文化和环境所造就的诗人。

屈原出身于楚王同族，自然同楚文化传统有着极为密切

的关系。楚在战国时期虽与中原各国有着频繁的交流与联系，但它仍然保持了较多的自己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的一种表现，就是当中原各国以严肃的社会政治法则观察和处理有关国家军政问题的时候，楚国却还保存着比较浓重的巫风。这种较为原始的风俗不但在民间大量存在，形成楚国民间“信巫鬼、重淫祠”（《汉书·地理志下》）的现象，就是在宫廷内部，这种情况也时有表现。就在屈原生活的楚怀王时，曾以祈求鬼神的办法来与秦国抗衡。“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师，而兵挫地削，身辱国危”（《汉书·郊祀志》）。至于在怀王之前，这种情况似乎更为严重。东汉桓谭《新论》中曾载，楚灵王“简贤务鬼，信巫覡，祀群神，躬执羽帔舞坛下。吴师来攻，国人告急。王鼓舞自若，曰：‘寡人方乐神明，当蒙神佑，不敢救。’吴兵遂至。”竟然在对方重兵压境的情况下，不去发兵援助，而妄图依靠神灵佑助，而且亲自参加祀神活动，这种巫风的盛行可见一斑了。巫风影响于文化的直接结果，一是大量的神话传说得以保存，不但有口头的流传，甚或还会通过图画的形式留存于后。王逸《天问序》就曾记载，屈原“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僬僬，及古贤圣怪物行事”。虽然王逸的记载对于《天问》未必可靠，但这种情况恐怕并不完全是想象之辞。二是随之而来的音乐歌舞的发达。王逸《九歌序》称：“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在先秦时期，音乐与诗歌创作有密切关系。楚地乐舞的发达自然对诗歌发展有重要影响。三是卜筮的普遍和流行。在决定重大问题的時候，往往以卜筮手段来决疑。这些，都成为屈原诗

歌创作的深刻文化背景，并且在其诗歌创作中有明显的表现。

楚国地处江南，长期以来被视为“蛮夷”。因而它在与中原诸国交往过程中，逐渐滋生出一种很深的维护自己国家尊严的观念。像《左传·成公九年》载，楚国的钟仪在被俘之后，仍然戴着故乡的帽子（“南冠”），弹琴时也要弹奏楚国乐曲（“操南音”），表示不敢忘怀自己的国家。这种对于故国的眷念之情，逐渐演变成一种爱国的情怀和意识。春秋战国时期的纵横反复，士人各自寻求实现自己理想的途径，“朝秦暮楚”、“楚材晋用”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实在算不了什么怪事。但对故国的眷念之情，却使屈原即使受到严重打击，也决不离开楚国另谋出路。其他人一再劝他，他也决不远行，终致以身殉国。屈原于这种情感有一种执着的信念，这也是在楚国社会、文化背景上成长起来的。也正因为这种情操，屈原对于楚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切的了解和热爱，我们看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所熟练运用的楚文化内容，就很可以了解这一点了。

屈原在楚文化的独特背景之下，又对中原文化有着精到的修养。我们只要看看战国时期那些游客说士的言辞，使者行人的外交辞令，屈原要与这些人打交道，就必须熟悉和掌握中原文化的各方面知识。屈原生活前期的修养，楚王对他的信任和重用，都促使他必须做到这一点。因此，在屈原身上，两种文化因素得到了融合。这就为屈原诗歌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如果屈原在政治上一直十分顺利，他的远大政治理想能够实现，他就很可能成为政治家而不一定成为诗坛巨星。不幸的是，如前所述，他受重用的时间并不长

久。由于小人的离间中伤，楚怀王很快就疏远了他。他那一颗忠君爱国之心，他那实现国家富强的愿望，他的“美政”理想，都化作了泡影。他接连受到打击，并最终被放逐到偏远荒凉的江南之地。而在他的眼皮底下，楚国接连在对外斗争中失败，屡次受到秦国的欺骗和进攻，丧师失地。楚国处于风雨飘摇、岌岌可危的境地。这对于满怀爱国之心的屈原来说，实在是痛苦的现实。一颗热烈的心，面对着惨痛的局面，于是，郁积的满腔悲愤，借助于他丰富的文化修养和知识，利用了楚地固有的诗歌形式，得到了抒发和展现。于是，一种充满个性特点的诗歌出现了。在这些诗中，展开了对邪恶势力的批判，对理想的歌颂和追求，对拳拳爱国之心的表达。这些诗，感动了楚国的民众，因而流传下来。“楚人惜而哀之，世论其词，以相传焉”（王逸《九章序》）。也正是这些诗，使屈原成了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成就卓著的诗人，成为诗坛上的耀眼巨星。

二

屈原的诗，充满了个性特点，富有创造力。

屈原第一次将诗歌从集体创作的道路改变为个人创作，使诗歌成为抒发个人感情的有力工具。屈原是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在他的作品中打上了异常鲜明的个性烙印。因而，屈原的诗歌就具有了强烈的抒情性。在屈原的诗作中，不见叙事性的作品。即或有叙事的片断或内容，也完全笼罩在抒情的氛围之中，成为抒情的有效手段和组成部分。如屈原的《离骚》虽然带有自叙的性质，但完全是以抒情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这且不论，就是像《涉

江》、《哀郢》等篇章，都直接记载到屈原的行程或经历，但抒情意味的强烈是任何人都能体会到的。如《涉江》中写到：

乘鄂渚而反顾兮，欸秋冬之绪风。步余马兮山皋，邸余车兮方林。乘舲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凝滞。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

作者把整个行程、景物都染上了自己特有的情绪，叙述的内容变成了情感的化身，体现出强烈的抒情性。

屈原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作品中个人情感的抒发已经升华为一种能引起人们共鸣、感动的典型情感。有着相似情感基础的任何人，都能从中感觉到自己的心声。这种感情已经冲破了作者主观感情的范围，而成为诗歌中抒情主人公的感情，从而实现了它的典型性，造成了巨大的感染力。如屈原通过自己的作品表达出的“存君兴国”的炽烈爱国情怀，矢志不渝的追求、奋斗精神，理想不能实现的忧愤，无不激动着千百年来无数的仁人志士，就正是这种情形的最好说明。

屈原作品的抒情性强，还有赖于艺术方法的恰当运用。屈原作品大量运用了神话、传说的素材，大量运用了想象、象征等艺术表现手段，从而形成了被后人称之为积极浪漫主义的艺术特征。神话传说材料的运用，使抒情更为博大深邃。像《离骚》中上扣天阊、下求佚女，驾飞龙以游八极等想象的描述，是屈原精神活动的形象再现和内心情绪的强烈抒发。这种情形，类似于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评论：

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

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

呼天、呼父母都是表达难以控制的强烈感情的。因此，这些想象性的描述，瑰丽奇玮的境界，对抒情性的加强是重要的。另外，象征手法也系统地表达了作者的好恶爱憎之情。王逸在《离骚序》中说：

《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

作者通过这些形象，组成了一个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留给读者一个咀嚼感情的广阔空间。浓郁的诗情自然从中流出，并且使抒情尽其曲折反复，动荡流走，深沉有力。

正是这种强烈的抒情性，使屈原诗作闪现出不断追求的理想主义的光辉，造成了深沉感人的力量。

屈原诗歌的创造性，不仅体现在高度社会性、现实性内容与强烈抒情性的结合上，还在于他以自己的艺术创造，丰富和提高了我国古典诗歌的艺术表现力，创造出一种全新的诗体来。

屈原的诗，历代都作为“楚辞”的代表。“楚辞”作为一种新的诗体，体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这就是“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黄伯思《东观余论》）。但这仅仅是表面上的东西。如果把它放到整个诗歌发展的历史中加以考察，它的创造可以从以下方面体现出来。

一是结构的宏伟完整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句式句法的组织安排。屈原在自己的创作中，不要说比之以前的《诗经》，

就是与以后的许多诗歌相比，结构也是宏伟阔大的。正是这种宏大的结构，更适宜表现丰富复杂的内容。比如屈原的代表作品《离骚》，不但形象地表现了主人公半生的经历和奋斗，表现了感情的波澜和变化，还表现了主人公的努力和追求，展现出一个宏阔壮丽的境界。再如《九歌》，以一套完整的祭歌形式，展开了一个神灵的世界，一个恢宏的图景。这就是以前的《诗经》所不能比拟的。

结构的宏大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它们的完整性。虽然屈原作品结构错综变化，但都有完整清晰的脉络。它不像《诗经》中的抒情诗，大多在刻意抒发一种情思，或通过一个片断表达一种特定的感情，而是往往抒发在一个相对完整的过程中的感情变化，在篇章结构上体现出一定的完整性。正是有了这种结构的完整性，它才能保证内容的完整，也才能表现出一个完整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体现出情绪的变化起伏，才能支撑起宏大雄伟的整体来。

与宏大的结构相适应，屈原的作品在句式上打破了以往的四言为主的定式，使句子加长，韵律更加参差灵活。在一对句子中，上句往往用一个“兮”字作句尾，既密切联系下句，又增加了抒情气氛，使整个作品产生一种回肠荡气的效果。比如叙述性很强的《离骚》的开头：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
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
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有的则略作变化，将“兮”字移在句中，但仍不减其抒情意味，如《九歌·湘夫人》的开头：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风，

洞庭波兮木叶下。

正是这种较为绵长又大体整齐的句式，才能容纳更为丰富的感情，传达出更为细致的神韵。并且可以更自由地组织韵律的变换。

屈原的作品每一篇都是带有个人特征的，是屈原创作殿堂的精美建筑物。这些建筑物各自展现出特定的个性风采和丰富创造力。屈原正是以自己的这些作品，作出了他在我国古典诗歌发展历史上的贡献，确立了他在诗坛上不可动摇的地位。

三

屈原不仅以自己的诗歌创作，而且以自己的人格光辉受到后人的推崇和景仰。我们选注屈原的诗歌，不仅是一种对优秀文学作品的普及和继承，而且也是对民族优秀精神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选注屈原的诗，首先是作品真伪的鉴别。屈原的作品流传两千多年，在作品真伪上有许多争议。本着审慎的态度，注重坚实的证据，参照历来学术界对屈原作品的研究成果，我们选注了包括《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招魂》在内的共二十四篇作品。在这些作品中，《远游》的可疑性最大，但考虑到它历来被标明为屈原所作，而且在艺术上有些新的表现，对我们了解那个时期的创作有益，而且也很难断然确定它是伪作，因而予以保留。

在底本的选择上，我们选用了王逸《楚辞章句》本（与洪兴祖《楚辞补注》合印的本子）。之所以选择它，因为它是目前《楚辞》诸本中所见的最早刊本，应当更接近于原

貌。

在注释中，我们尽量参考了诸多注本，吸收了它们的研究成果，对有些歧义纷纭的解释，结合了自己的阅读体会，折衷确定，以求尽量妥贴准确。吸收诸家成果，未能一一注明，以省篇幅。不敢掠美，故言及之。

屈原的诗歌，是我国古典诗歌的瑰宝；屈原的人格，是仁人志士的典范。继承其优秀传统，借鉴其创作经验，是铸成我们新的文学、新的民族精神的必需。我们期待着这种新局面的到来。